

转让多处资产 湖北宜化意在保壳?

本报记者 王金龙 西安报道

对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宜化”,000422.SZ)而言,在2019年上半年经营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保壳或是当务之急。

转让资产遭问询

2019年9月19日,湖北宜化公告,为了盘活资产,改善资金状况,拟以4.26亿元将三峡国际金融大厦100%的股权转让给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依靠卖资产扭亏为盈,在上市公司中已经屡见不鲜。

2019年9月19日,湖北宜化公告,为了盘活资产,改善资金状况,拟以4.26亿元将三峡国际金融大厦100%的股权转让给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夷陵国资”),交易价格4.26亿元。如果最终成交,将为湖北宜化带来约3亿元左右的投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据公告显示,在此次交易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夷陵国资向湖北宜化支付2.15亿元转让价款,余款于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也就是说该资产的处置收益最终需要体现在2019年的年报中。

另外,本记者从宜化集团一位消息人士处获悉,上述被处置的三峡国际金融大厦原本为宜化集团总部所在地,位于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由一栋裙楼和两栋塔楼构成。该大厦原系一个尚未完工的“烂尾楼”项目,2003年5月,湖北宜化通过拍卖方式购得该大厦,2004年4月,开始对该大厦进行续建施工,2005年底竣工,2006年10月,该大厦完成装修投入使用。该消息人士亦称,三峡国际金融大厦有部分商业办公区域曾对外出租,每年亦有数百万元的收入。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湖北宜化频繁筹划售卖资产,其中,在9月份,其拟整体转让三峡国际金融大厦,交易价格4.26亿元;拟转让新宜矿业60%股权,交易价格不低于评估值1.36亿元。

对此,记者向湖北宜化方面求证,但相关人士仅表示以公告为准。记者通过天眼查检索发现,宜化集团的工商登记地址与三峡国际金融大厦的注册地址均为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在转让三峡国际金融大厦的事宜尚未落锤的情况下,9月23日晚间,湖北宜化又发布公告称,因煤化工产业布局调整,公司拟将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宜矿业”)60%的股权对外转让,交易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进行,交易价格不低于评估值1.36亿元,且此次股权转让已获宜昌市国资委批准。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新宜矿业的资产总额为7.73亿元,负债8.0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201.15万元;2019年1至7月新宜矿业实现营业收入3525.18万元,净利润亏损2.31亿元。

即便如此,截至2019年7月31日,新宜矿业仍被估值为2.27亿元,60%股权对应的市场价值为1.36亿元。经测算,如交易以约定价格成交,将为湖北宜化带来约1亿元收益。

上述两笔资产的转让除备受外界关注之外,亦受到深交所的注意。深交所向湖北宜化出具

这意味着,如果顺利的话,上述资产转让计划将为湖北宜化在短期内获得数亿元的进账。但截至2019年上半年,其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共计115.98亿元,转让资产收入与这一



湖北宜化厂区。

本报资料室/图

的问询函指出,转让三峡国际金融大厦给夷陵国资,标的账面原值18501.36万元,账面净值为6610.78万元,评估值为42628.41万元,交易价格为42628.41万元。要求湖北宜化说明本次出售标的交易价格的估值方法和计算过程,并且选取参照物等论证本次评估价格的合理性。

除此之外,深交所亦指出夷陵国资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一会计年

度净利润远低于交易价款等情况,要求湖北宜化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支付能力,以及交易价款的资金来源。

对于新宜矿业60%的股权转让事宜,深交所除了要求其进一步补充资产评估增值率测算的原因及合理性之外,还要求补充披露审计评估基准日后向新宜矿业提供担保的原因、金额和期限,并说明解除担保的时间期限设置合理性。

湖北宜化2019年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其资产负债率达91.91%,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共计115.98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增长135.36%。货币资金32.62亿元,其中4.49亿元受限。

除此之外,湖北宜化还为旗下多家子公司进行担保。本报记者梳理湖北宜化公告发现,其分别分别为太平洋热电、新疆宜化、青海宜化等子公司向多家银行进行贷款担保,担保共计17笔,担保合计总额超过1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宜化在2019年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湖北宜化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其营收为72.21亿元,实现净利润为5038万元,扣非净利润则是亏损1.35亿元。

湖北宜化方面在财报中表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年上半年公司主导产品烧碱销售价格较2018年出现较大降幅,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公司转让子公司雷波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71.50%的股权,回笼资金1.19亿元。

据悉,湖北宜化的主营业务是化肥产品(尿素、磷酸二铵等)、化工产品(聚氯乙烯、烧碱等)的生产、销售。目前,化肥、

资金链吃紧

湖北宜化2019年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其资产负债率达91.91%,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共计115.98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增长135.36%。

除了对上述资产转让事宜进行问询之外,深交所还要求湖北宜化结合流动负债情况、现金流状况、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及还款安排等因素分析公司的偿债风险,是否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

湖北宜化2019年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其资产负债率达91.91%,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共计115.98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增长135.36%。货币资金32.62亿元,其中4.49亿元受限。

除此之外,湖北宜化还为旗下多家子公司进行担保。本报记者梳理湖北宜化公告发现,其分别分别为太平洋热电、新疆宜化、青海宜化等子公司向多家银行进行贷款担保,担保共计17笔,担保合计总额超过1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宜化在2019年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湖北宜化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其营收为72.21亿元,实现净利润为5038万元,扣非净利润则是亏损1.35亿元。

湖北宜化方面在财报中表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年上半年公司主导产品烧碱销售价格较2018年出现较大降幅,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公司转让子公司雷波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71.50%的股权,回笼资金1.19亿元。

据悉,湖北宜化的主营业务是化肥产品(尿素、磷酸二铵等)、化工产品(聚氯乙烯、烧碱等)的生产、销售。目前,化肥、

化工行业已处于成熟期,市场竞争激烈。2019年上半年,湖北宜化部分产品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如果按照扣非净利润来衡量湖北宜化,那么其已经是连续6年亏损了。”一位券商分析师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国内化肥产能过剩严重,企业盈利偏弱,如果目前的相关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化肥企业要想大幅度盈利,难度很大。

事实上,湖北宜化也并非首次卖资产,其在2016与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公司披星戴帽,濒临退市。随后,在2018年,湖北宜化出售了3家子公司股权。其中,新疆宜化80.1%股权确定投资收益高达8.09亿元。借此,2018年湖北宜化扭亏为盈后,于2019年4月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同时,鉴于公司扣非净利润为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深交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仍从“*ST宜化”变更为“ST宜化”。

这意味着,湖北宜化并没有解除退市的预警,且在2019年上半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况下,转让旗下资产或许已经成为最有效的保壳措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夷陵国资虽然愿意接手三峡国际金融大厦,但是其近年来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至于新宜矿业60%的股权,由于其处于亏损状态,谁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可再生能源千亿元补贴之困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北京报道

可再生能源千亿元补贴难题有望得到缓解。

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9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说明》显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预算数为835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48.9亿元,增长6.2%;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出预算数为866.1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27.22亿元,增长3.2%。

此外,延续了7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发放机制或将成为历史。近日,有消息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国家将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序。

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陶治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上述政策落地,对于未进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更大体量的项目将直接受益,对于项目经济性和企业现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义。同时,未来绿证配合消纳责任权重在解决补贴缺口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要发挥绿证更大作用,有效扩大绿证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绿证交易门槛。

欠补之痛

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水涨船高”,相应的补贴资金缺口也如滚雪球般持续增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超过1400亿元。

千亿补贴拖欠压力之下,堪称光伏行业第三次危机的2018年“5·31”新政出台,迅速冷却2014—2017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火热市场。在补贴降低、规模指标压缩的影响下,以拥有电站重资产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压力暴增,宛如咽喉紧扼。

据记者统计,2018年,在26家光伏上市企业中,超六成企业的业绩同比出现降低或亏损,多家企业的业绩下滑幅度超300%,企业荣誉减值、资产减值和存货减值等情

况屡见不鲜。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5·31”新政之后光伏电站交易开始活跃。企业纷纷抛售电站资产断臂求生,承受压力之重不言而喻。据《2019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白皮书》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容量为50MW,较前两年保持稳定,下半年则陡增至1295MW。

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长期拖欠、融资成本高企及高负债运行等问题,加上“5·31”新政的重创,曾经重资产运营的协鑫新能源(00451.HK)于2018年以来便开始战略转型,向“开发—建设—合作—运维”轻资产及售后服务输出的经营模式转变。在频繁抛售电站基础上,协鑫新能源

补贴发放机制或生变

不过,这种苦于补贴拖欠的光伏和风电企业或将迎来一些新变化,资金压力也有望缓解。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从销售电价中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当然这也是补贴资金的主要来源。次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标准定为2厘/kWh,2016年起提高至1.9分/kWh。

但是,多重利益博弈之下,实际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资金并不理想。因此,补贴拖欠问题愈演愈烈。有数据显示,前7批纳入目录新能源项目每年补贴需求在1500亿元以上,而实际每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补贴金额仅有800亿元左右。

从规模上看,纳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风电项目约109GW,光伏

项目约50GW计算,截至2018年,尚未进入补贴目录的风电项目75GW,光伏项目约124GW。

从2012年开始,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出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第一批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目录,经过审核进入补贴目录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按规有序地拿到财政部发放的补贴。

截至2017年3月,财政部启动了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申报工作,后于2018年6月补贴目录名单公布,这也意味着2016年3月之前的项目装机规模拿到了补贴通行证。

不过,第八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申报工作却迟迟未开展。

9月底,有消息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

展在2019年6月还酝酿转让51%股权给华能集团。

民营企业之外,带有国资“基因”的熊猫绿能(00686.HK)也未能独善其身。

为偿还债务及改善经营现金流,熊猫绿能自2018年以来“自救”动作接连不断。以2019年下半年为例,熊猫绿能率先引入北京能源集团作为股东,后又密集抛售电站资产。9月初,公司密集发布公告,拟以1.985亿元向招联绿昌新能源及山西丝路电力亏损出售招联绿昌及招联绿变全部股权,还要作价2.39亿元出售山西神池两个风能发电站95%股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两家企业转让资产的背后,正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迟迟没有兑现。截至

2019年6月30日,协鑫新能源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88.11亿元,熊猫绿能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37.63亿元。

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快速过渡到竞价和平价时代,而多数民营企业却开启了“紧衣缩食”过日子模式。其中,部分民营光伏企业放慢电站扩张步伐,与此同时国资企业则反而乘势加码新能源。

风电龙头金风科技(002202.SZ、02208.HK)的一位员工曾向记者透露,公司不仅压缩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本,还有可能出售电场融资回笼资金。从金风科技2019年上半年业绩也可以看出,公司业绩表现为增收不增利,其中营业收入157.33亿元,同比增长42.65%;净利润11.84亿元,同

比下滑22.58%。

由于电价、可再生能源补贴等方面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0月9日晚间,中闽能源发布公告称,放弃对木垒大石头200MW风电项目的投资,放弃对中国闽(木垒)风电有限公司8500万元出资额的出资。

此外,从智汇光伏统计的2019年光伏竞价和平价项目名单中也可以发现,民企获得指标规模6200MW,国企获得7613MW,全球第二大光伏电站运营商协鑫新能源却排在了第12位。

北控清洁能源的一位项目开发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电价下调的因素影响,风电行业抢装潮再现,并且几家大企业都在各地抢装新能源市场。

有一定意义。并且,从未来有限资金的分配来看,拿到同等比例应收补贴资金,对于后来的项目有一定优势。

他还认为,未来绿证配合消纳责任权重在解决补贴缺口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公开信息显示,9月25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作价800万元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与自愿绿证认购政策研究及技术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下一步的绿证,首先要满足2020年即将实施的消纳责任权重市场化履约的方式。同时,要发挥绿证更大作用,有效扩大绿证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绿证交易门槛。”陶治建议,交易价格要有一定弹性,具备市场化机制。同时,交易范围可以由电力消费者扩大到能源消

消费者。